

邮储银行恭贺“感动社区人物评选”活动启幕



在社区提公民榜样这个概念非常好,中国社会需要这样的榜样,勇于负责,看到社会出问题的时候,不是埋怨和等待,而是要行动,尽我所能来解决社会问题。

——王振耀

王振耀： 中国太需要 发现普通人

中国社会需要什么样的公民榜样,与雷锋有什么不同,公民如何参与日常公益?结合5年来新京报评出的感动社区人物,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进行了深入解读。

对话人物：

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 王振耀

(上接A18版)

虽然使外来人员尤其是农民工摆脱户籍的限制还有大量工作要做,要等待国家政策的改进。但在社区服务和社区建设的政策上,我们可以做到的,就没必要拘泥于户籍制度。讲句实在话,做社区服务,有没有北京户口,实际上没多大差别。

因此,我们在实际、具体的社区工作和社区服务、管理政策上,只要不与“上位法”冲突,都可以按照实有人口来覆盖,不要再考虑京籍或非京籍,流动人口和非流动人口。不要人为制造障碍,否则这个扣儿很难解开。

全市网格将分 三批搭建

新京报:在社区建设工作上,北京市社会工委有没有全面的推进计划?

宋贵伦:推动社区建设,按照市委市政府要求,北京从2008年起,就开始实行“四步走”战略。

第一步是实行社区规范化调整,经过三年多调整,这个任务已基本完成。全市从7个方面27个项目入手,解决社区基础设施缺乏,基本运作不规范问题。具体来说,解决“三有一化”,“三有”即有地方办事,有经费办事,有人办事;“一化”即工作规范化。有地方办事:社区350平方米的办公用房覆盖率今年上半年已达到66%,到今年年底能达到

81%,明年基本全覆盖;有经费办事:社区办公经费目前均已纳入区县财政预算,有固定经费保障;有人办事:目前全市2700多个社区拥有3万多专职社区工作者,平均年龄41岁,81%有大专以上学历,一支年轻化、知识化的社工队伍已初步形成。

2009年起,社会工委又牵头在全市推行社区60项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,大到居民附近就医、上学,小到体育锻炼器材、家电维修,协调相关业务主管部门,调查社区需求,“缺什么补什么”,今年年底可覆盖2000多个社区。

2010年,北京启动建设“一刻钟社区服务圈”,预计今年能覆盖到60%的城市社区。

今年5月底,在朝阳、东城、顺义三区试点基础上,北京市全面启动网格化工作,解决社区管理精细化和智能化问题。

网格化就突破了户籍界限,需要收集大量实有人口在服务需求和管理问题方面的信息数据,还要实现人、物、事的动态跟踪,相关部门的信息共享、对接。因此,打基础很重要,否则划一张网格摆在那儿,没用。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工作,我们不冒进,从今年下半年到明年,力争分三批完成搭网工作:先覆盖141个街道和大部分乡、镇,然后延伸到社区,再从区县层面整合、升级,最终实现网格社会服务管理平台全覆盖。

新京报记者 魏铭言 萧辉

公民榜样和雷锋 有区别

新京报:这5年新京报报道的感动社区人物,其实就是一群热心社区公益的公民。你觉得,近几年公民参与公益的方式有什么变化?

王振耀:许多社会问题随着经济发展表现得越来越突出,在妇女、儿童、老年人等方面的各种提升性问题越来越尖锐。现在的公益慈善与以前不一样了,基本一年一变。现在的新一代人做公益慈善有很多新理念。这些人的使命感、组织化程度、建设性力度,我想是过去,甚至去年上半年都不能比的。大家直接参与救灾行动,像房山救灾,老百姓冲在前面,农民工救人、为人打灯、自发去机场送人……这个社会现在变得太有意思了。

还有微公益,年轻人的创新配合网络技术,大家都行动起来。民间也承担起应急性救助,比如天使妈妈救助各种重伤重病的孩子,过去哭天天不应,现在立即有人站出来承担,我这个年龄就不敢想,他们的献身精神我很佩服。

另外,还有以邓飞为代表的人,居然敢推动制度完善,他们不是批判性的民间力量而是建设性地参与,这之前也是我不敢想象的。

新京报:今年感动社区人物评选的主题是“公民榜样”,你认为公民榜样应该是什么样,和雷锋这个榜样是否有区别?

王振耀:公民榜样和雷锋是有区别的,雷锋是传统性的政府提倡学习的榜样,公民榜样是老百姓自发的。过去有个漫画,说有个人看到水龙头流水了,他就一直等着看谁来管,看了3小时,说没人管,这不是一个绝妙的讽刺吗?为什么不自己直接关了?遇到问题时我们并不是为了表扬,个人认为该做的就做,这是公民的新榜样。但我们在这方面还远远没打开。

在社区提公民榜样这个概念非常好,中国社会需要这样的榜样,勇于负责,看到社会出问题的时候,不是埋怨和等待,而是要行动,尽我所能来解决社会问题。

应鼓励开办家庭 基金会

新京报:你刚刚提到这方面还远没打开,是什么原因导致的?

王振耀:需要体制转变。要有体制允许人们来做,市政建设是政府的责任,不能让公民插手?没有这样一个平台,就是我们很大的问题。在英国,大家排队捐公园的椅子,搁在我们这儿,大家会认为是政府的事,会马上分得很清楚。但在英国、美国,不会因为这是政府的责任而不管,觉得自己有能力就做,不管政府有没有能力做。

另外,我国目前成立基金会要200万元,是全世界最高的门槛。美国几千美

元就能注册一个基金会,这种基金会才是社会的基金会。比如,想让自己的小区变得更漂亮,植物、椅子等等,都可以捐。

一旦家庭基金会鼓励起来,社区的很多问题都可以解决。这个要提倡,如果中国在这方面开放,将释放出巨大的慈善力量,我们的孩子都有压岁钱,有的动不动就万八千的。个人捐款、捐物免税落实起来也相当困难,这个必须改。

新京报:很多人认为,既然是政府的责任就该由政府来管,为什么还要让老百姓去做?

王振耀:这种观念就要转变。过去咱们社会是以家庭和国家为本位,家家自己种菜做事,不知道有个“社会”。大家后来突然发现,空气是社会的,食品安全问题是属于社会的。现在公共空间出来了,公共需求特别多,还是用传统的管理体制肯定不行。一个台阶坏了,这个让政府马上拨款修?太慢,这在哪个国家都一样。

一系列的公共事务要解决,就需要一种公共精神,新公民精神就是一种新的公共精神,它来解决面临的各种公共问题,公共问题是多样、具体的,非常细的。我在美国看到凳子后面钉了个小铜牌,上面写着谁谁捐赠,当时觉得奇怪,美国人说在这里都是这样,大家觉得很正常。但要做到这样,前提是要有家庭基金会,捐完可以免税。这些家庭基金会能解决社会里出现的小问题。

要尊重解决小问题 的人

新京报:我们报道过的感动社区人物,做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小事。我们如何去鼓励更多人做平民公益?

王振耀:中国社会太需要发现普通人了。我们的文化传统不愿意去发现普通人的高贵品质,总是谈得太宏大,就会让老百姓觉得离得太远。恰恰是社区的事,需要去尊重发现这些解决小问题的人,要鼓励这种活力,这是真正的社会生命所在。如果都在等着3小时看谁来关水,都推给政府做,政府怎么可能可能是万能的?

中国发展到这个阶段停不下来,是一个提升性的阶段。提升性阶段是大众化的事,需要社区这种跨界公民精神。

慈善恰恰是跨界的,特别是现代慈善,我们不要把社会和政府分得太清楚。

新京报:我们发现5年来评出的感动社区人物,以20岁到40岁年龄段的居多,你怎么认为?

王振耀:所以说中国有希望嘛,这个年龄段恰恰以80后为主,他们开放、主动、个性。我的感受也是,以前社会上总说80后这不好那不好,2008年我突然发现,我们五六十岁的人不如80后、90后的人想法个性。他们愿意从身边做起,不扔垃圾就是不扔,我有看到过街上的小孩制止爷爷奶奶闯红灯,老年人反而催孩子,骂孩子。

新京报记者 王卡拉